

「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坊紀要

翁稷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口述歷史作為歷史學旗下的專業領域之一，有其淵遠流長的發展歷程，更是近代史研究者所不能輕忽的史家技藝，吸引了大量史學研究者的投入；而無論口述採訪的進行方式，或最後成果的整理與運用，都引起了學界長期的討論與關注。然而，口述歷史不僅只是訪談的收集層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這些厚實的口述成果，轉化為實質研究的應用和取徑，進而替史學研究注入新的活水，將是下一階段的重要挑戰。2015年3月20、21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舉辦的「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坊，其主旨即在思考及回應口述歷史在研究層面所能帶來的新刺激。

如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及此次工作坊主辦人游鑑明教授於致詞中指出的：近年來以口述史為名的會議不勝枚舉，但內容多是對口述歷史人才的技術培訓，缺乏從學術研究的層次，理解、探討口述歷史的研究可能性。換言之，口述歷史是由個人訪談的方式所留下的史料，理應成為研究者所重視的素材，開發出新的研究議題，而非束之高閣。本次會議即試圖運用已經出版的口述歷史專書來尋找新的研究課題，或就特定研究議題探討口述史料與其他史料的異同關聯，由實務操作層次提升到研究與理論的層次。

此次會議前身為游鑑明教授、林志宏教授和王超然博士三人所發起的「口述歷史讀書會」，每月以一本近史所出版之口述史專

書為對象，由成員輪流導讀，並邀請主訪人到場分享訪問的過程及所遇到的問題，集思廣義，深入思索口述歷史的各個面向。本會議之所以「工作坊」為名，即是想保留並突顯這層嘗試的意義。本次會議共計有五個場次，發表了 11 篇論文，並有來自中國大陸、日本、臺灣等不同的研究團隊，雖然研究的課題和對象各不相同，但每篇論文都可視為一次口述歷史的新試驗，希望能吸引學界更多關注、投入口述歷史的研究。

第一場會議由近史所林志宏教授發表〈口述史的利用、問題與實際——以戰後東北接受經驗為例〉，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對東北「淪陷區」的接收為例，透過與其他文獻資料比對的方式，試著釐清口述史料的價值何在。關於東北接收的相關記憶，受時代氣氛或不同背景的影響，有各式各樣的敘述；有別於官方檔案的單一聲調，個人的回憶呈現出眾聲喧嘩的複雜面向。唯有通過對口述史料的通盤觀照、交叉比對，並參考不同族群與圖像記憶，才有辦法勾勒出文獻資料所無法企及的地方視角和個人生活史。第二篇論文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常成教授的〈選擇中立國的「反共戰俘」：韓戰戰俘「志願遣返」過程中的第三種選擇〉，討論韓戰結束後，聯合國依據「志願遣返」原則，對中國戰俘所進行的處置。當時有三分之二「反共戰俘」送往臺灣，本文關心的是在遣返臺灣過程中，選擇前往中立國的 12 名中國戰俘。透過對其中

一名戰俘——程立人的口述訪談，比對美軍審訊紀錄、臺灣軍方檔案，以及其他戰俘的描述，試圖描繪程立人由從軍、被俘到選擇中立國的過程。本場次的討論，主要聚焦在口述歷史和回憶錄兩者的差別，常成教授提出或許可從責任的角度來區隔兩者，回憶錄由當事人負責，口述歷史的責任從必須由訪談人承擔。

第二場次的兩篇文章為近史所陳耀煌教授的〈談革命：口述歷史裡的中國農村基層政權變革〉，以及北京中華女子學院中國女性圖書館李慧波副主任的〈追求大歷史與個體生命的融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小學女教師為例〉。陳教授的文章以 1990 年代初期，日本學者三谷孝等人對中國農村所進行一系列調查及口述訪談，集結成的《二十世紀華北農村調查記錄》為主要史料，討論革命前後農村的基層變革，特別是農村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說明各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傳統地方秩序的運作模式，一直延續到 1949 年才被澈底打破，隨著政治氣氛的變化，農村領導的所需要的特質也不斷變化。透過口述歷史和官方檔案不斷的對話，才有辦法顯現農村底層的複雜變革。李教授的文章則指出口述歷史「由下而上」的史學視角，並援用社會科學的生命歷程理論。全文以三位 1940 年代從事小學教師的女性口述紀錄，析理時代和個人之間的互動，三人的一生有時代的影響，也有各自的生命歷程，呈現出歷史的立體和多元。該

場的討論，則針對訪談者的身分——如外國人背景對口述的影響以及受訪對象的代表性問題，進行意見交流。

第三場次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佐藤仁史〈被切斷的記憶——從一位「富農」的敘述看近代江南的農村社會〉，和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皮國立教授的〈口述歷史視野下的元首醫療與健康——以「兩蔣」總統為中心的討論〉兩篇文章。佐藤教授的文章回顧了日本學界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傳統，以及自己實際參與太湖流域社會史調查的經驗與心得。正文以一位所謂的「富農」為訪談對象，由他的敘述中，析理「耆老」在江南農村扮演的角色，以及地緣、血緣、神緣等複雜的社會關係。最後，則以「講述的記憶」和「不被講述的記憶」作為結語，指出在口述過程中，記憶自我更改的情形與「沉默」的意義。皮教授的文章在討論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人在臺灣的醫療照顧、醫病關係和對健康的看法，試圖呈現出兩人的「凡人」面，以及對身體和疾病認知到形塑。因為事涉機密，是官方資料難以呈現的，但在相關醫師、醫院和侍從人員的口述歷史陸續出版後，這樣私領域的研究於是變成可能，重新從「人」的角度去看待政治領導者。發表後的討論，集中在日本田野調查傳統的問題意識，陸續出版的史料對兩蔣生活面研究的補充，以及口述訪談該如何設計讓不同背景、階層的聲音得以發聲。並有與會者指出，「無聲之聲」

或許正是口述歷史最大的貢獻。

第四場次為近史所連玲玲教授的〈Writing History on Their Own: Oral History of the “Old China Hands”〉、中原大學通識中心柯惠鈴教授的〈抗戰、記憶與性別：女性口述訪問記錄中的戰爭經驗與敘事〉、近史所王超然博士的〈從日記、口述歷史談抗戰時期日常生活的異與同〉3篇論文。連教授的文章以加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的 Old China Hands 的口述歷史計畫為主要資料，該計畫訪問了 46 位於二戰期間居住於中國的外籍人士，本文藉由這些訪談，討論他們的自我認同、為什麼願意參與訪談，以及如何回憶過去。透過對 Old China Hands 計畫的檢視，可以看出受訪者接受訪談的根本動機，在於保有自我的記憶。他們對過去的了解和想法，成為能被保留的歷史紀錄，口述歷史不僅是史料的留存，同時也為思考「記憶的歷史」（the history of memory）開啟新的可能。柯教授的文章旨在討論抗戰時期普通人的「戰爭經驗」，尤其著重於女性的性別觀點。在過往國族敘事的框架下，戰時女性形象多半呼應著特殊的宣傳需求，造成個人的生命、生活經驗則被埋沒。作者透過對大量口述歷史的梳理，重新挖掘出抗戰時期女性在面對時代劇變時，人生、家庭等日常生活的掙扎，讓人們對戰爭的想像及理解，不再只有大我的勝敗論述，亦有了對小我的人文關懷。王超然博士的論文則希望能

跳脫以往國民黨與中共對抗戰史觀的既定框架，由個人的角度重新呈現當時的多元面貌。以口述歷史和日記為資料，挖掘出淪陷區、重慶大後方、延安三地的日常生活，透過對個人小歷史的觀察，重新思索個人和時代之間的關聯。會後的討論提及口述資料所能提供歷史的多元面貌，如性別觀點等被埋沒的聲音，使單一事件可以有更多的視角。在該場的討論中，國史館呂芳上館長特別提醒，如何讓小我和大我的歷史敘事能充分對話是很關鍵的挑戰；此外，研究者亦必須去思考各種口述歷史背後的產生背景。

最後一場則由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林敬智教授發表〈從口述歷史看近代精英的本土宗教經驗與態度——兼論宗教信仰在口述歷史中的重要性〉，以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柯小菁發表〈追尋中的主體性：中國苗族婦女口述歷史的建構〉。在林教授的論文中，口述訪談紀錄重新描繪中國民間信仰和上層精英之間的關係，民間信仰經常被視為社會底層的迷信，在近代反宗教、反迷信的思潮下，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但通過口述訪談時，少部分不經意觸及的宗教經驗，反而更能真實反映近代精英的宗教觀點和信仰世界，並進一步的析理出近代中國宗教的形塑與破壞過程。作者亦期盼日後能有更多以宗教經驗為主題的口述歷史，不單是宗教史研究的用途，也能深化對歷史人物的理解。柯小菁小姐的論文以口述史重新建構少數民族婦女的主體性。隨著近年關於苗族

女性的口述史陸續出版，這些在漢人歷史敘事中屬於邊緣底層的聲音，得到了被重視和研究的可能；經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這些苗族婦女她們個人生命歷程與家庭、族群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當國家體制挾現代化之勢進入村落後，這些苗族女生在兩個不同文化之間，具有穿梭、適應的兩難。會後的討論則涉及了口述訪談的過程，針對特定議題，「有意」和「無意」之間的差別；以及弱勢族群如何從口述過程中充分表露自己的意見，進而讓主體性的建構成為可能。

最後的綜合討論時間，由游鑑明、李洪濤、佐藤仁史三位教授共同主持及引言。佐藤教授的發言分為三點，第一點是口述紀錄如何文字化的問題，當事人的故事述說和採訪者文字紀錄之間，有一道隔閡需要轉換，如何在尊重當事人記憶和採訪者專業的情況下，保有敘事的生動、情緒和重要細節，是十分困難的考驗。採訪者的發問也更形重要，因為問答方式的不同，不僅會影響當事人的敘述，也會左右日後文字的整理。第二點則是口述紀錄和文獻資料之間的關係，透過比較的方式，除了判斷史實的正確與否外，亦可開發口述歷史的研究潛力；經由兩者的比對，以及各種不同口述紀錄之間的對照（比如地方層級的紀錄、不同背景或不同語文的口述），或能開發新的研究課題。最後則是口述歷史的方法論和有效性，當事人所敘述的記憶多少是來自自己經歷，或於日後受到環境所慢慢改變與添加？又或者當

事人僅代表個人或某一種立場，會不會讓研究者失去了對歷史大圖像的掌握？都是在使用口述歷史時必須小心的。無論如何，相較於官方檔案，口述歷史還是更為貼近現實、更具有「人」的色彩，這些口述紀錄所留下的各式線索，可視為歷史事實的擴音器。北京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學系李洪濤教授則關注於性別觀點在口述歷史中的影響，她指出對女性進行口述訪談的困難，如何取得信任，並讓其表達自己的生命歷程，是採訪者的一大挑戰，對當事人而言，毋寧也是一種療癒。好的口述史可以讓女性充分說出自己的故事，建構出女性獨立的主體意識，而不是重述男性的觀點。

游鑑明教授則對兩日的會議進行總結的思考，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提醒研究者在使用口述史料進行研究時，必須在「在不疑處有疑，有疑處不疑」，需特別留意或不斷追問下列幾點：一是誰在口述以及誰在做口述？必須要注意當事人和採訪者的背景與立場。二則是對口述史料內容可信度的判斷，哪些可疑哪些可信，這就必須涉及資料的比對，不能以孤證的方式大膽引用。第三點則要注意口述歷史的多元可能，是跨越時空、區域、階層、性別的，可以豐富我們對歷史的單線理解。第四點則是小歷史和大歷史之間的關係，如何將零碎、非主流的口述

運用到大歷史之中，口述史料是否能靠回應甚至推翻既有的大歷史論述，當事人的小我回憶是否能不受大我論述所左右？上述都是在使用口述歷史進行研究時必須時時省思的。

第二部分則是口述歷史所能開展出來的新議題，游教授指出口述歷史本身就是新議題，其生產過程、發表目的，都是值得被研究的。此外，口述歷史也能提供多元的視角，補充或糾謬既有的歷史敘述；亦可貼近生活層面，尤其重新發現性別、底層民眾等容易被忽視的課題。在以檔案資料為主的政治史研究上，口述歷史也能另闢新局，除重新審視諸如中央與地方之間這類重大課題外，也能由小我層次，重新看待人和體制之間的諸種互動和關連。同時經由比較的方式，如不同記憶之間、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口述歷史甚至能呼應全球化的新視角。最後，則是如何再現口述歷史，即一則則個人的口述資料要如何轉換成整體的、具問題意識的歷史研究，必保留原來「人」的因素於其中，將是研究者最大的挑戰。然而也唯有如此，也才能呼應以「人」為核心的歷史書寫傳統，將形形色色的「人」重新帶回歷史中，這或許才是口述歷史最重要的議題與任務。